



書評：《塞外傳教史》

林瑞琪

書名：《塞外傳教史》

編者：古偉瀛

出版者：光啓文化事業

出版日期：二零零二年

國際書號：ISBN：957-546-448-6

頁數：四百八十頁

元旦之前不久，接到台北南懷仁文化中心送來新書《塞外傳教史》，捧讀之下，頗有得著。順手與讀者分享。

事實上，這是我第二次閱讀《塞外傳教史》。去年九月份，該書接近完稿的階段，台灣南懷仁文化中心的潘玉玲女士，經已將該書的電子檔傳來，請我為新書出版時準備一篇書評。儘管網上閱讀經已成為我的工作一部份，但假如可以選擇的話，我還是喜歡印刷本。所以新書來到，要「重新」閱讀一篇，感受又完全不同。所以在此也建議讀者到書局找一部來看。

言歸正傳，《塞外傳教史》顧名思義，講述長城以北地區的天主教傳教歷史。何以塞外可以成爲一個獨特的傳教地區，乃因爲一八六零年代，教廷將中國塞外地區委托給新成立的比利時聖母聖心會。

本書的優點很多，其資料的豐富是要點之一。有些過往未有面世的檔案材料，特別是法文的資料，經過重新整理之後，首次亮相在中國教友面前。

另外，本書亦收錄了不少前人的作品，重新編輯出版，當中計有隆德理神父在一九三九年所著

的《西灣子聖教源流》和《張雅各伯神父傳》；孟振生所著的《薛瑪寶神父》等等，這些都是絕版甚久的傳教史書籍，在坊間差不多完全沒有機會可以找到，僅可在極少數的圖書館中可以借閱。現在南懷仁文化中心將這些珍貴的資料重新印行，對研究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以至塞外人文文化發展史的學者，都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善舉。

不過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本書的優點在於收入了不少古老材料，缺點也在於收入了古老材料，卻未有加以重新考證，這似乎是十分可惜的事。

視野角度方面，編者與一衆作者似乎仍流於西方角度，以Daniel Verhelst的「向中國傳教的比利時」一文爲例，詳細講述了聖母聖心會來華期間，如何與法國政府角力，以爭取難能可貴的傳教空間。然而，Verhelst通篇文章當中，卻隻字不提聖母聖心會與清廷的往來，既不問清廷是否同意，連清廷是否樂見比利時傳教士的到來，也一概不談。就好像聖母聖心會的傳教士所到地方是法國

的殖民地一樣。

一八六四年清廷，對整批的傳教士進入內陸，仍是看得非常著緊。聖母聖心會祖南懷仁神父到達中國，肯定不能不與清廷打交道。出關更要清廷的批准及「保護」，Verhelst 的文章中僅提及一次「韓默理主教和桂德真神父到肅州，總督左宮保（左宗棠）對他們的態度十分惡劣。」（頁 170）其餘地方，就好像他們根本不是在中國一般。Verhelst 的文章一方面反映他在採集資料上的困難，另一方面亦反映其整理資料的方向頗有問題。

有些輕微的編輯安排上的問題，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，編者古偉瀛教授在書末補充了一份「國籍神父名冊」，資料詳盡，且經過多方考證，甚具參考價值。然而，略感可惜的是，該名字下訖於一九五零年，而將五零年以後晉鐸者摒棄在外。筆者的疑問是，何以要在將界線劃在一九五零年。我們明白任何歷史檔案的整理都必須有具體時限，否則將會永無止境地漫伸下去。問題在於：一九五零年

是否合理的界限？

我們須知神父的晉鐸並非偶然的孤立事件，而是七十大修院陶成的果實，五十年代晉鐸的多位神父，正是五零年聖母聖心會被迫離開中國之前的修生。目前的呼和浩特教區主教王希賢、集寧教區主教劉世功、赤峰教區主教朱問漁均在該時期晉鐸。由此筆者質疑到，「國籍神父名冊」是否應該後移至一九六零年。六零年之後的晉鐸，的確是另一個階段的事了。

本書名為《塞外傳教史》，但對聖母聖心會到華之前的塞外情況，著墨尚嫌太少，僅在第一篇的前面部份有作導言的簡述，似乎日後仍有補充的需要。

也許筆者的要求是有點吹毛求疵，任何書籍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。儘管有以上種種不足，但瑕不掩瑜，《塞外傳教史》對我輩研究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的同道而言，仍是難能可貴的貢獻。 □